

赛义德

张 跖

后殖民理论研究

915

复旦大学出版社

赛义德

张 跖 著

后殖民理论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张跣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309-05643-3

I. 赛… II. 张… III. 赛义德,N.(1935~2003)-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9592号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

张 跣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马晓俊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3千

版 次 200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5643-3/I·395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概 要

爱德华·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他是当今世界用英语写作的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也是批评领域“多元文化主义的奠基者之一”。

本书认为,后殖民主义把知识生产、文化霸权、现代性和民族国家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情。就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本身而言,赛义德的作品,特别是《东方主义》的中心地位,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赛义德对于东方主义话语的质疑,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共谋关系的研究,对于批评的世俗性本质的探讨,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思辨,都不仅为后来者的论战开辟了战场,而且有助于整体界定后殖民领域。可以说,几乎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每一个基本问题上,赛义德都做出了实际的理论贡献。尤其是,他对“霸权”理论和“话语”理论的调和,对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重新反思,对“差异的经验”和“混杂的文化”的细微体验,对“对位阅读法”的精心应用,对知识分子“流亡”与“立场”的思考,都赋予所研究的问题以新的视角、新的内涵和新的生长点,尽管有时候可能存在纰漏,甚至可能困难重重。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的捍卫则使他成为 20 世纪后期献身知识分子的一个范例。

本书同时指出,尽管赛义德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试图注入一些历史的、经验的成分,但是,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始作俑者,后殖民主义的种种缺陷都或多或少地和他有着一定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种种问题在

他的理论和思想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整体而言,后殖民主义试图超越具体历史,将自己置身于普遍化的情势中,试图以文本代替历史,并将某些文本特权化,而无视其他文本。实际上,政治经济学和革命的文本已经从后殖民文本中消失。即使是它所标榜的所谓“混杂性”也不过是所有不同文化相遇时的共同特征,完全缺乏特异性。而这一切显然也是赛义德所未能幸免,也不可能幸免的问题。

赛义德一直在试图调和“结构”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始终在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间游移不定。他所宣扬的流动主体性的观念,一方面,确实有助于民族知识分子在争取国际文化平等关系与争取国内自由知识分子身份之间形成良性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对文化认同的流动性和世界性的一味宣扬,容易导致无视文化认同的民族性根基,最终可能走向虚妄甚至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包括赛义德在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内,又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外,而是与它保持着一种切线关系。这样,就他们同西方统治历史的关系而言,就既可能是一种紧张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共谋关系。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世界之间”:赛义德其人其文	3
第二节 话语场:后殖民地形图	10
第三节 赛义德与后殖民主义	18
第四节 赛义德与福柯	24
第五节 关于本书写作的几点说明	30
第一章 “开端”:康拉德和维柯	39
第一节 康拉德与创作的意识层面	40
第二节 维柯与“开端”的世俗性	48
第二章 “东方不是东方”:关于东方主义	61
第一节 《东方主义》的观点和成就	64
第二节 “杂交视角”:东方主义的界定	73
第三节 难解的症结:“霸权”与“话语”	85
第四节 东方主义与马克思	93
第五节 “东方不是东方”	99
第三章 “世俗批评”:世界、文本、批评家	105
第一节 与后结构主义的交锋和借鉴	106
第二节 对美国“左派”文学批评的反思	113
第三节 世界、文本、批评家	122
第四节 理论旅行和理论逾越	130
第四章 “叙事的许可证”:巴勒斯坦问题	137
第一节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	139
第二节 “叙事的许可证”	144

第三节 “无援的声音”	150
第五章 “共谋”和“抵抗”:文化与帝国主义	160
第一节 折中方法:福柯、威廉斯、法依和艾略特	163
第二节 “共谋”与“态度与指涉的结构”	171
第三节 “对位阅读法”	181
第四节 “差异的经验”与“混杂的文化”	190
第五节 走向抵抗的人文主义	199
第六章 “不得其所”:赛义德的文化认同和学术意义	211
第一节 “流亡”及其二律背反	213
第二节 “旅居”: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	221
第三节 差异主义与混杂性	229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0

导 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作为全球化语境中颇具成就和影响的理论衍生品,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角色和作用也越来越引人注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西蒙·杜林(Simon Dublin)所提示的,全球化意味着金钱成了文化无所不在的氧气,意味着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是潜在的跨国联盟和对手,也意味着文化的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成成整体和传统^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代表的不是种族和殖民主义斗争的终结,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这样一种力量——通过它,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持续地重新组合和配置;通过它,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本土的关系变迁不断地得到新的证明。

后殖民主义研究涉及众多问题,如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以及种族、阶级与性别的关系等。尽管派别众多、观点分歧,但是所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都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换句话说,尽管后殖民主义是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中崭露头角、逐步发展起来的,尽管它本身仍然是西方

^① 西蒙·杜林:《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理论话语内部的某种自我反思和调整,但是它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其后果纳入到西方学术的事业当中,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尤其是,它把知识生产、文化霸权、现代性和民族国家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情。这样,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问题——及其成就,就不仅是关于西方的,而且是超越西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是观之,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民族来说,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成败得失显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后殖民研究领域,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他单枪匹马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探讨殖民话语以及殖民话语理论的时代。赛义德的作品,特别是《东方主义》在这个领域中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可以说,《东方主义》“开创了后殖民领域”(霍米·巴巴语),是“这个学科领域的源卷(source book)”(斯皮瓦克语)。在英语文学、历史学、比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区域研究及政治学科,形形色色的作者,或者把《东方主义》作为自己的后殖民研究的重要参考和理论起点,或者从赛义德的著作中获得灵感。斯普林克(Michael Sprinker)评论说:“这些领域的专家对他的介入常常提出批评,但是总的来讲他们却不能轻视他,也不能把他摆脱掉。”^①同样地,尽管同赛义德有诸多分歧,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仍然认为赛义德和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是今天用英语写作的两个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

具体到赛义德本人的理论成就,作为一个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居的思想家和实践家,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反思,对世俗批评的关注,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探讨,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宗主国文化关系的思考,尤其是他关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文化混杂性与差异性问题的深入

^① Preface of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Michael Sprink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探索,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探寻民族振兴的现代化之路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同样迫切。

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文化,必须关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化研究的最新成就;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尤其需要关注后殖民理论的成就与不足,关注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并从而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及其走向问题。赛义德思想的得失成败无疑是我们当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

第一节 “世界之间”:赛义德其人其文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年11月—2003年9月),美籍巴勒斯坦裔著名的文学学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始作俑者,“仍然健在的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的通才’(a Renaissance man)——这不仅因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而且因为他同时是一个人权行动主义者、文化批评家、政治学专家、音乐发烧友(a music aficionado)”^①。赛义德的著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西方文化经典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的研究,以《东方主义》^②(1978)、《文化与帝国主义》(1994)为代表;第二,对中东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以《巴勒斯坦问题》(1979)为代表,此外还包括《报道伊斯兰》(1981)、《谴责受害者》(1986)、《和平及其不满》(1994)等;第三,对批评的世俗性本质的探讨,以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为代表,包括《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1968)、《开端:意图与方法》(1975)等;第四,对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责任的思辨,讲演录《知识分子论》(1994)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表述。此外,对话集《笔与剑》(1994)、回忆

^① 发表于 www.amazon.com 上的有关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的书评,作者为 Susan Muaddi Darraj。

^②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国内被译作《东方学》,这自然是为了突出此书的学科史背景。但是,考虑到赛义德本人对这个词的使用更强调学术史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这里我们还是将书名翻译成《东方主义》。

录《不得其所》^①(1999)、论文集《流亡沉思录》(2000)、访谈录《权力、政治和文化》(2001)等对于理解赛义德的思想成就和政治斗争也具有重要意义。

赛义德 1935 年 11 月 1 日出生于耶路撒冷。赛义德自己曾经说过,“虽然是巴勒斯坦人,但是我们信的是圣公会;所以在伊斯兰多数族(majority)背景中的基督徒少数族(minority)中,我们仍然是少数族。”^②其实,远不止是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孤立无援。几乎是从一出生开始,年幼的赛义德就经历了常人无法体验的深刻的心理磨难——语言的分裂、身份的困窘、爱与压抑之间的挣扎。

赛义德从小是在阿拉伯语—英语双语环境下成长的。一个是他的母语,一个是他受教育及后来治学与教学的表达语言。语言的分裂成为赛义德生命中的一个基本分裂,赛义德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最先讲的语言到底是英语还是阿拉伯语。我只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互相共鸣。有时是讽刺的,有时是怀旧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互相纠正和注解的。它们都像我的母语,但都不是我的母语。”^③这种分裂几乎贯穿赛义德全部的生活和写作过程。赛义德的著作迫使西方认识到在他的创造和他自身的形象中非西方世界应有的地位。但是,他分析的文学和音乐作品绝大部分属于西方经典,他本人的著作绝大部分也是用英语写就的。无论如何,这都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说想要避免这样的悖论几乎不可能。因为,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用英语写作;要影响学术界的工作,就必须关注那些博得了广泛读者和学术界认可的作品。这也许是所有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姓名和身份问题是赛义德自小就难以面对的问题,更是几乎困扰其一生的问题。他自己的阿拉伯姓氏和美国名字相互冲突。赛义德自己

① 《不得其所》英文原文为 *OUT OF PLACE*, 台湾版书名译为《乡关何处》,内文中有时候也译为“格格不入”,本人以为译成“不得其所”似乎更为恰当。

② Imre Salusinszky, *Edward Said, See Criticism in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 Methuen, 1987, p. 128.

③ Edward Said, *On Memoir Writing*, See *London Books Review*, April 28, 1999.

写道：

“‘爱德华’这个傻乎乎的英文名字与无疑是阿拉伯人姓‘赛义德’的牵强组合。”他花了 50 来年的时间才逐步适应。在他已经是年过七旬之后，这种困扰仍然刻骨铭心、难以释怀。耶路撒冷、开罗、黎巴嫩、美国都是一套复杂、密致的价值网，是他成长、养成文化认同、形成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意识的非常重要部分，但是“这些身份是互相冲突的，我一辈子都无法释怀这种身份意识，我曾经期望我们要么是地道的阿拉伯人，要么完全是欧美人，要么干脆是基督教徒，要么完全是穆斯林，要么完全是埃及人，等等，这期望现在想起来仍然是那么刻骨铭心。”^①

最为重要的是，赛义德年幼而敏感的心灵早早地就体验了各种形式的权威的压制。从耶路撒冷到开罗，从 GPS 小学到维多利亚学院，赛义德处处感受到“以一个殖民地事业为形式的有组织体系”，体验了无所不在的“殖民地权威”。在埃及的 GPS 学校，赛义德经常受到英国同学的歧视、侮辱，甚至遭到老师的毒打。他深深地体会到他与英国孩子的不同。“在我心中，他们是有家的，而最深刻意义上的‘家’是我一直无缘的东西。”（第 57 页）在维多利亚学院，赛义德恶名远扬，被看作是擅长煽动暴民的惹祸精。上课讲话，同其他反叛的目无师长的首领同声一气，对老师的提问常常话中有话或者答非所问。在赛义德看来，这就是他所能采取的对英国人的抵抗。

不仅如此。赛义德所反对的不只是殖民者的权威，他反对一切种类的权威，哪怕这种权威来自于他的父亲。在他眼里，父亲代表了权力与权威、理性主义纪律和压抑情绪的一种非常结合。少年时代，赛义德不仅滥用自我意识，而且创作色情文学。对于父亲所代表的来自家庭的压力和控制，尽管多年以后，回首充满压抑和反抗的往事，回首父亲的专横苛刻

^① 赛义德：《乡关何处》。台北：麦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 187 页。本节以下各部分引用此书，只标页码，不再详注版本。

和沉默寡言,赛义德顿悟到一种“可以直接依靠的支撑”,以至于每每情难自禁,潸然泪下,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持久涌动着的仍然是叛逆和断裂。赛义德的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从1942年开始,他就与一个叫多莱士维尔的小村庄有着密切的联系。70年代初期,在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村民愿意把当地墓地中的一小块土地卖给他作为他最后的安息地。赛义德注意到,他的经验迫使他痛苦地认识到,他的父亲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巴勒斯坦人,不管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快乐,居民们不能容忍他长期存在,即使是已经死去”^①。这样一种对“家”和流亡的复杂感情,以及时时处处无不感受到的异乡人的境遇,成为赛义德心路历程的永久主题。

1950年,赛义德被父亲送往美国,195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赛义德深深地感觉到,“思想上的信念与对部族、宗派、国家的热情忠诚之间无法调和的本质,开始在我内心出现,而且至今无从弥合,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弥合这道裂隙,我至今让它们保持对立,而且始终觉得应该优先的是思想意识,而不是国族或部落意识,无论这种本末先后的取舍使一个人多么孤独。”(第384—385页)1960年和1964年,赛义德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对赛义德影响最大的是维柯的《新科学》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前者奠定了他以“世俗性”为核心的文化批评观念,后者则引发了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1967年是赛义德生命历程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六日战争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此之前,学术与政治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此之后,两者合而为一。在他心目中,1967年所体现的纷乱包蕴了所有其他失落,诸如他的少年岁月和成长世界的消失。他写到:“1967年以后,我非复昔日之我;那场战争驱使我回头寻找那一切的起点,也就是为巴勒斯坦的斗争。……反权威主义,突破被强迫的噤声,最重要的是发出不谐和的声音,重新面对无法调和的事物之间本来就有的那种紧张,从而粉碎、驱除一套不公不义的‘秩序’。”(第402页)1969年,时任以色列

^① Nubar Hovsepian, *Connections with Palestine*, See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7.

总理的果尔达·梅厄在一次讲话中说：“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根本就不存在。”赛义德闻此异常气愤。他后来回忆说，正是梅厄这番话使他“重新考虑写作的观念和用语问题”。在他看来，再现的政治学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意味着，他们的历史和自决不能被简化为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因为这种运动最早起源于锡安山附近，所以称为锡安主义——引者注）的功能，因为他们的生活、文化和政治有其“自身的动力，并最终有其自身的真实性”^①。自1970年代后，赛义德开始在政治上介入巴勒斯坦运动。1977年，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赛义德当选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议员。爱尔霍特说，“当时赛义德出席是因为需要他出席。”因为担任国民会议员是同巴勒斯坦人民保持团结一致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对他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的肯定。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使他作为一个“巴勒斯坦自治的坚决支持者”发挥积极的作用^②。

爱德华·赛义德的政治参与一直以来就十分引人注目。他以具体的活动身体力行自己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解和信念，时时处处表现出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正因为如此，他和著名的语言学家、政治评论家、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60年代末美国“校园运动”的精神领袖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样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具争议的学院人士。在公共领域，赛义德既不依附于任何强权，又不拘泥于任何偏见，既举足轻重，又备受责难。他热切关注现实政治，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勇气，言人之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由于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赛义德被许多西方人士和犹太人视为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代言人，被扣上“暴力教授”的帽子。他和他的家人不断受到死亡威胁、暴力行为和谩骂，甚至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曾经被犹太人防御联盟纵火烧毁。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以英文公开呼吁巴以双方承认彼此曾经的苦难，求同存异，和平谈判的巴勒斯坦人，并且由于他公开声援遭到阿拉伯世界追杀的阿拉伯裔英国籍作

① Edward Said, *The Questions of Palestin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 112.

② Nubar Hovsepian, *Connections with Palestine*, See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13.

家拉什迪的言论自由,赛义德又被列入“中东死亡六人名单”上,而他的学术和政治著作也竟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世界中遭到查禁。在《笔与剑》的序言中,阿赫默德(Eqbal Ahmad)特别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在贝鲁特举行的一次露天宴会上,突然发生了枪战,人们纷纷避之唯恐不及,只有赛义德依旧谈笑风生^①。

在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多边构成的中东政治的巨大漩涡中,赛义德从来不曾偏袒任何一方,他始终站在他所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一边,对美国中东政策、以色列锡安主义、阿拉伯政权的专制、巴勒斯坦当局的权力滥用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同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和批判。当然,他的主要批评目标还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美国政府应当对巴勒斯坦人民长期承受的苦难负主要责任。1991年,赛义德被发现身患白血病。这并没有降低他的政治激情。他曾多次去中东地区,仍经常在阿拉伯各国的报刊上撰文,阐述他对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主张。他表示,只要时间来得及,他将撰写一部巴勒斯坦历史,改变目前某些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书写巴勒斯坦历史的“歪曲垄断”,让世人通过巴勒斯坦人“真切的眼光”真正了解巴勒斯坦。1992年海湾战争前后,在与英美舆论背道而驰的声音当中,没有哪一个人能比赛义德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英美国国家反对派知识分子中言论被引用最广、评论最多和出版论著最多的人。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后,赛义德对巴勒斯坦当局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批评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认为,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和巴勒斯坦当局的建立,使得阿拉法特不仅背叛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奋斗目标,而且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2000年7月因为偕同黎巴嫩民众向以色列边境护栏投掷石块,赛义德被记者抓个正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在关于此事的一项声明中,赛义德指出:“一件小事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好像这个掷石事件比我过去35年来为争取正义、和平所做的努力还要重要;又好像这件小事,甚至足以与十几年的军事占领和掠夺,所造成的无数蹂躏和苦难

^① Edward Said, *The Pen and the Sword*, Edinburgh: Ark Press, 1994, p. 8.

相比拟。”^①2001年“9·11”事件之后，赛义德在英国《观察家周刊》公开发表题为《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的文章，呼吁停止恐怖活动，并指出“‘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绝对不应该是让人们盲目追随的旗帜”。2003年夏天，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时间，赛义德还在《伦敦书评》发表了题为《通向何方的路线图》一文，对美国提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进行公开质疑。他指出：“路线图与其说是通向和平的计划，还不如说是谋求和解的设计图”，“在生硬笨拙的文体中频繁出现的‘履行’这个术语也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才是实际的行动者”，所有的提议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些根本问题完全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暴行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以色列的侵略所导致的结果”^②。

在回忆录的结尾，赛义德以流水的意象来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这样写道：

“偶尔，我体会到自己像一束常动的水流。我比较喜欢这意象，甚于许多人比较重视的那种固态自我的形象。这些水流，像一个人生命中的各项主题，在清醒时刻流动着，最佳状况的时候不需外力去协调或调和。它们可能不合常情，可能格格不入，但至少它们流动不居，有其时，有其地，行程林林总总奇怪的结合在运动，不一定是往前运动，有时是彼此冲撞，如同对位法，没有一个中心主题。这是一种自由，我喜欢想，尽管我并非完全相信这是自由。这样的存疑，也是我特别要坚持的主题之一。我生命里有那么多不谐和音，已学会不要那么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第405页）

无休无止，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心有旁骛，总是保持警惕，不得其所，永远处于“世界之间”^③。正是这一切造就了赛义德真正不同寻常的地方：既

① 有关内容见2000年7月13日的美联社电讯。

② 中文译文见《读书》2003年第11期。

③ 《世界之间》是赛义德一篇自述性文章的题目，收录于他的文集《流亡沉思录》。“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这个词组较好地概括了赛义德的人生轨迹和思想立场。

维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又对民族主义本身保持一种极为怀疑的态度。而这恰恰是赛义德自己所推崇的这种真正知识分子的流亡状态。

在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在出版的二十部各种类型的著作中,赛义德的全部工作可以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权力、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复杂的、重要的关系的分析探讨。政治在他的生命和写作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赛义德的最新一部访谈录性质的作品就是以《权力、政治和文化》(2001)命名的。按照该书编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维斯瓦纳坦(Gauri Viswanathan)的说法,“赛义德谈论文学时极少不介入政治,而谈论政治时又极少不介入文学”^①。显然,文学和政治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不仅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们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几乎可以这么说,他的全部写作活动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围绕着身份政治和排他政治展开的对文化差异和再现问题的探讨。对赛义德来说,“笔”虽然不能担当起“剑”的全部功能,但却有着“剑”所不能比拟的犀利与深邃。以笔为剑,并且身体力行地超越“书斋里的革命”,这也许就是他的追求。这样,“笔”与“剑”就不仅是一本访谈录(《笔与剑:与巴萨米安的谈话》,1994)的响亮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生活,至少是一种精神追求的象征。

第二节 话语场:后殖民地形图

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始作俑者和中坚力量。无论是他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批评的世俗性本质的探讨;无论是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思辨,还是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都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的思想成就必须首先放置到后殖民主义话语场中,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切实的理解和分析。

^① Gauri Viswanathan eds,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New York: Pantheon, 2001.